

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华长慧

自《莫里尔法案》问世，范·海斯提出“威斯康星思想”以来，高校与“服务”天然地结下了情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迫切需要知识的强力支持，作为知识型组织的高校如何服务经济社会成为高校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提出，是以人、教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逻辑起点，试图为我国地方高校提出一种新的发展样式，为地方高校服务经济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构建凸显服务的本质与特征，它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学生就业、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双向互动、可持续发展作为直接诉求的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在这种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自身提升发展的双赢格局。

(一)主要内容

构筑服务型人才培养体系、服务型知识贡献体系、服务型学习服务体系是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

服务型人才培养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人才培养的重新定位，服务型人才培养体系在人才培养理念上，更加注重服务意识；在人才培养主体上，更加注重企业社会的参与；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面向市场、就业导向；在人才培养机制上，更加主张以能力为中心、多样化的培养方式。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标准不能千篇一律；从人才成长的角度来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各自不同的教育诉求，要求有不同的成长路径与之相适应。因此，服务型的人才培养体系体现人才培养方式与方法的多元和多样。

服务型知识贡献体系是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型高校知

识贡献的层次、种类、数量不尽相同，其在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差异，但服务是它们的共同指向。服务型知识贡献体系承担着发现新知、研发技术，并且应用于经济社会的重要职能，是高校服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体现。在知识生产、传播、转化三个环节中，既承担新知识、新技术的生产，又承担技术推广、知识的转化和应用。服务型知识贡献体系主要包括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组织要素包括高校科研管理机构、高校科研主体、高校所联系和服务的企业、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度要素包括政府和学校与科研和知识贡献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措施及其运行体制和机制等。前者是高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载体，产学研活动的主体，后者是促进和保障前者有效运行的条件。

服务型学习服务体系的核心是为所在区域提供有效的学习资源和渠道，并构建学习指导、学习信息交流的平台与网络，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提高区域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所蕴含的价值，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服务型学习服务体系的目标和任务是：促进不同学习型组织的形成，整合各类教育与培训资源并形成统一的新型服务平台，变单一培训主体为多元培训主体，实现培训对象由被动向积极主动的角色转换，为更多需要接受培训的对象提供机会和途径，等等。

(二)三个特征

一是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服务特征。首先，高校服务职能的凸显，这将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和层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有利于高校发现更多、更实际、更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科研命题，培养出更多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的人才，积极推进协同创新。其次，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以其服务体系密切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也拓宽了学校的筹资渠道，缓解我国教育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使得学校更加重视办学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保证教育的健康发展。再次，这里的“服务”也指一种关系，反映关于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经济社会发展又依托于教育。在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中，所谓“服务”同时又蕴含着“依托”的含义，这就有利于高校与地方之间的合作，实施协同创新。

二是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区域特征。任何区域教育体系首先应是区域化的，因为任何教育都与区域经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区域的教育体系

也都应当是有个性的教育体系，因为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结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出台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使得区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国民经济向区域化、特色化和互补性方向发展，“大一统”的教育体系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形成——一个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教育体系。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经济发展迅速，2012年，宁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524.7 亿元人民币，城市综合实力增强。但是，宁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已经形成的主导产业、优势产业、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就显得相对落后，为经济转型升级所能提供的支撑显得薄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理念，以形成一个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需求相适应的区域教育体系。

三是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可持续性特征。在教育相互关系上，一方面，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要求以服务为导向，推进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服务型教育体系要求推进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和谐联动，使教育事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接。在教育管理上，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要求更加注重学校办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加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更加注重学校创业文化的培育。由此，整合教育内部资源，加强教育内部各方的融合与协作，增强服务能力，整合教育与外部经济社会的资源，走开放教育之路，实现教育经济联动发展，从而，推进区域高校的转型，创新高校与企业、经济和社会结合的通道，改革政府对区域高校的管理行为。这里，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充分显示出它结构的系统性、机制的灵活性和体系本身的开放性特点，给教育带来无限的发展活力和不竭的内在动力，具有高度可持续性的特点。

二、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实践指向

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实践指向在于让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从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走向经济社会建设，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

(一)促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成功对接

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目标，是要通过实现区域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把教育的发展融入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当中，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在这种教育体系下，教育对经济社会的人才支撑能力、知识贡献能力和学习服务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有机结合成为现实。

审视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不仅表现为产业整体的拓宽，而且表现为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深化，投入、产出比例和产业内部结构的有序变动，这种升级需要科技和教育的支撑，尤其需要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注重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研发相关科研成果，才能有效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注入新的发展要素和内生能量，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由此，地方高等学校必须具有服务型的办学理念，按市场需求进行办学定位，及时调整学科、专业、层次结构，更新人才培养模式，超越学校教育中知识本位、学校本位、课堂本位的教育定势，一方面为地方培养大批创新型、技能型、应用型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帮助企业研发新产品，攻克科研难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促进大众化条件下区域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从精英到大众再从大众到普及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目前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当中，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展以及采取什么路径和模式来发展的问题。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来看，要实现 2020 年毛入学率 40% 的目标，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还要翻一番。面对未来发展目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在哪里？能否获得足够的物质支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努力构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大学，让学校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作为明确定位，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科研成果等作为战略选择，坚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务方向，才能赢得属于学校自己的一片天地。

(三)促进区域地方高校制度创新

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从其本质上讲，就是要构建一种“服务型”的教育制度构架，让高校的发展实现有计划指令向经济社会需求导向的转变，而且使得这种转变由外在指令型变为内在需求型。换言之，在这种制度构架下，学校的

生存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经济社会的服务程度或贡献程度,通过这种创新,真正确立起教育规律与经济规律、教育发展与市场需求、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地方大学实现这种转变,其基本路径就是进行知识资源的转化。

地方大学作为一个知识性组织,蕴藏着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一方面,大学可以依托知识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大学可以依托知识反哺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这里所需要的是大学应该在传承知识,创新知识的同时,让知识资源衍生出知识资本,服务社会,满足社会主体的特定需求,而大学在推进知识资源衍生知识资本的过程中,无论是组织特性,人才培养,教学管理,还是科学研究,都将会不自觉地纳入知识资源衍生出知识资本的过程,对高校而言,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这里,大学必须把握的是衍生过程中获取社会资源与知识传承的统一,与学术发展的统一,与育人功能的统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三、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实现路径

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实现路径就是其实现方式的选择。综观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现状,我们认为需要从三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要加快实行区域高等教育转型;二是要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三是要切实变革政府管理行为。

(一)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所谓转型发展,就是要使地方高校的运行发展与教育的服务属性相符合。地方高校的这种转型包括办学理念、发展战略、办学定位、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转型等,通过转型,使地方高校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和实力,使地方高校的运行发展始终遵循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这一要旨。

在办学理念上,地方性、应用性、服务性应当成为地方高校办学理念的内涵特点。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区域经济结构紧密对接,并且对其变化迅速作出反应。

在办学定位上,其办学目标定位,应侧重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其办学类型定位,应以教学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学科研型大学。这种科研需要注重研究经济社会提出的现实问题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推进面向区域的产学研合作;其办学特色定位,应体现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符合人才培养发展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独特办学特征。

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要突出应用性学科建设，强调专业设置与行业发展对接，并实现由线型向多型、由散型向聚型、由平型向立型、由单一型向多元型的转变；要建立学科专业设置的市场评议机制、学科专业结构主动耦合区域产业结构机制、区域特色人才培养平台的市场适应机制和学科专业自我调节、更新机制。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逐步形成以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为主线的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础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实践教学平台；以就业为参照的人才评价制度。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既要强化师资队伍整体发展规划，又要落实教师个体成长规划。从整体上看，师资队伍既要体现地方性又应具有国际性；既有超前性又有现实性；既要注重专业要求又要注重师德标准。从教师个体分析，教师要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教师的实践要从单一教学型向教学技能型转型，教师的研究要从基础研究型向应用和开发研究转型，教师的教学方法要从传统教学手段向现代教学方法转型，教师的治学要从简单重复向求精创新转型，等等。

目前，地方高校组织目标不明确，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需要重构组织目标、构建地方现代高校制度、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调整内外关系，尤其要调整地方高校与外部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发挥地方优势，倡导校际联合，形成综合优势。

(二)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我国校企合作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是校企合作的发展期，校企合作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职业学校从企业分离，自成体系，学校成为教育主体，校企合作由企业为主变为引企入校。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进入政府主导的校企合作快速发展期，从组织形式、培养方式、校企合作紧密程度三个维度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校企合作，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为合作的主要取向。

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校企合作模式，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根本。其中，政府是突破校企合作体制障碍的关键因素，政府要在发挥校企合作体制创新中的引导作用。学校是校企合作体制创新的实践主体，学校要通过创新校企合作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来实施，要在合作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是校企合作体制创

新的重要推力，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校企合作机制主要由政府导向机制、市场运行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构成，政府、企业和学校在机制创新中承担着不同责任。政府是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推动者，重在构建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学校是校企合作的主体，通过创新合作平台，在机制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则通过担任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提供科技需求和岗位需求信息和人才需求规格等方式发挥助力作用。

在校企合作的途径选择上，一是学校要把校企合作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企业要把校企合作作为提高企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托，要营造全社会支持校企合作的良好氛围。二是学校要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实践，把校企合作的深度作为衡量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重点学科、专业要致力于与规模企业的深度合作；出台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政策，让教师带着项目深入企业实践，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提高企业的合作积极性。三是要通过提升科技服务能力、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开展社会培训以及员工培训等措施，构建双赢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必须提供坚实的校企合作政策支撑。在国家层面，要大力鼓励校企合作。目前国家的校企合作政策大多属于宣示性、号召性政策，政策细度不够，很难执行。因此，国家应该为校企合作立法，明确不同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责任；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正在大力开展校企合作的制度建设，政策推动力在不断加大，进而所需要的是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特别是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以推进校企合作；学校则要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教师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2002年以来，在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下校企合作的实践中，宁波出台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与实施办法》；搭建了每年一次的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平台，开展优秀产学研案例评选，对优秀案例进行奖励，推进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创建了共建研发中心模式、政府学校企业共建产学研基地模式、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模式、订单培养模式以及“政府、企业、学校”共建、共管、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等。这些做法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学校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产生了明显成效。

(三)变革政府管理行为

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不仅是一种学校行为，而且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

在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条件下，改革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的领导与管理行为；带有根本性。这是一种由领导转变为服务，由管理转变为引领的重大变革。政府行为的引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念引领。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原先的领导角色转变为服务角色，从以前的管理位置转变为引领位置。政府要用以人为本的观念、学会学习的观念与成人成才的观念，来引领各级政府、教育单位和各类教育从业人员，以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心，推动教育改革。

二是需求引领。需求引领就是回答学校存在的基本原因、解决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动力问题。现代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众多需求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交互影响，诸如经济社会的客观需求、科学技术的发展需求、学术研究的自身需求等，我们不能仅仅重视某个方面的因素，而忽视另外一些方面的因素。政府的需求引领就是通过梳理学校各种需求，根据轻重缓急解决学校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促进学校发展。

第三是管理引领。就是促进大学在现行领导体制下的有效管理。地方高校可以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治校、教授治教和学生治学的管理架构。校长治校的行政管理架构，就是构建起以校长为主帅、行政人员为骨干、教辅人员为协助的校院两级纵横有序的行政管理团队。在教学上实行教授治教，是建设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大亮点。教与学从来就是将课程转化为学生素质、使知识迸发出智慧火花、让难题激励着真理发现的一个特殊认识过程。所以，学生治学的学习管理架构建设更是改革和建设现代大学管理架构的最终落脚点。在校长治校、教授治教前提下，学生们自我制订学习规划，自我调整学习态度，自我选择学习内容，自我决定学习方法，自我管理学习效果，自我检查学习质量。

第四是规划引领。规划引领是为了解决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方向问题。地方各级政府通过研究、制定和实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准确定位教育发展的功能和目标，明晰办学数量、招生人数、教师编制、校舍建设、设备设施等投入状况的总体规定，有效引领教育提升的路向和策略；教育质量发展的规划引领是要将高度重视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共识，科学制定教育质量发展的评估体系，制定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的有关政策规定，高度关注教育质量发展的实际情形。教育发展的规划引领是使教育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

发展。因此，要加强和改善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扩大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知情权、参与度，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提高规划的约束力。

第五是投资引领。投资引领是为了解决教育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资金投入与经费保障问题。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要求通过建立和健全投资引领机制，理顺教育经费的复杂关系，明确教育投入的经济社会意义，解决财务管理中的诸多疑难，确保教育投入的有效性。投资引领的关键是明确政府责任制，政府通过扩大教育行政经费拨款的力度，制定和实施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学科专业、不同科学研究领域的经费政策、资助制度与重点扶持等规定，来调动社会各界的教育投入积极性，逐步建立一个投入足额、匹配恰当、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投资制度。

第六是督导引领。教育督导是专设行政机构和人员根据有关教育法规和政策，对下级政府行政部门的教育工作和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等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活动。由于教育督导制约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立法的全面性、整体性与合理性，影响到这个国家和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保障度与有效率。所以，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政府行为的督导引领，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实践和现实意义。教育督导就是要通过督政、督教、督学，使地方高校遵循教育规律，更好地履行服务经济社会的职能。

（本文作者华长慧系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中外合作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同型比较

深圳大学产学研合作推进教科文协同发展

王燕华

一、背景分析

新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科技、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努力推进科教兴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尽管教育、科技和文化三个领域的国家规划纲要中都强调了科教文事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性，也都对此提出了一些新目标、新要求，但长期以来，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主要按照纵向发展模式，分别接受政府不同部类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条块管理，在三者的横向联系与融合发展方面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迫切需要进行这方面的观念提升、政策创新和机制改革。这不仅需要在政策导向、资金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向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重点倾斜，进行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更需要高校自身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科技、文化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站在协同发展、资源共享、和谐共赢的高度，打破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思想，实现高校整体和谐发展。

高校是教育、科研、文化三者自然融合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教科文协同发展的重要使命。作为深圳市唯一的地方性综合大学，深圳大学是深圳市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在促进科教文事业融合发展方面，深圳大学代表着一股重要的教育力量，对深圳市科教文事业的融合发展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大学历经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已将教育、科技、文化的基因深深根植于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职能中。一所大学要实现大学使命、履行大学职责，就必须推进大学与科研院所、企业、行业、社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方面实现和完成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引领的目标和责任。另一方面，站在大学的立场，我们更容易从大学固有的规律和组织特性去认识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内在关系，三者的有机结合正是大学组织经久不衰、历久弥强的意义所在。大学不仅是一种教育组织，也是大量科研组织的栖息地，大学更是一种文化组织，大学最能体现教科文的自然融合。随着国家财政对科教文事业投入资金的逐年增加，教科文财政财务管理工作的政策性需求更强，政策的规范作用更具广泛性和实效

性。就深圳大学而言，涉及教科文融合发展的各类科研、人才培养和为地方经济、文化服务的课题和项目有很多，国家财政对其支持的经费投入途径和投入力度也有所不同，它们关系到学校发展与改革的各个领域和环节。虽然教育是国家财政优先发展和支持的领域，但如此多的大学面对有限的资源都是一种竞争和挑战，如何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如何管好、用好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是高校应予以重视的问题。而作为地方公共财政，一方面要加大财政对高校尤其是本土地方高校的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完善财政财务管理体制，提高服务意识，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深圳大学在这方面所做的实践和探索，不仅对深圳大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促进教科文事业的融合发展，改革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及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深圳大学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而逐渐成长。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年以来，从办学的启动到今天拥有学科齐全、层次完备、人才汇聚和不断扩大的办学规模，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不断支持和持续投入的强大资金后盾。深圳大学成长发展的三十年正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重大转变和改革的三十年，这一时期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国家努力推进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1985年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财政部共同实施了“985工程”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为此，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加速建立和培育能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新优势和新实力。面对这样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趋势，深圳大学也在努力向着高水平、特色化、国际化的目标发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政策项目引导和财政经费支持，深圳大学不断拓展发展视野，与企业、政府机构、科研团体和社会组织开展了广泛的项目合作，在促进教科文领域的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和经验。

二、实践探索

（一）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的产学研合作之路

为适应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人才

的培养，深圳大学与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合作，于2009年10月成立“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学院采用公办民助的方式，依托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进行建设、运作和管理。这是深圳大学产学研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也是教育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典型例证。

学科建设方面，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设有一交通运输Ⅱ本科专业，下设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控制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3个专业方向。依托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轨道交通学院已设立二级硕士点——车辆工程专业，招收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引与控制、供配电系统、检测技术及安全工程等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推动学科建设和面向城市轨道交通科研能力与水平的提升。

科研平台建设方面，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拟通过建设“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与体系”，结合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科学技术与装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推进学院的科研平台建设和提高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能力与水平。将发挥优势、集中力量重点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科学技术与装备中的重大基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科学技术与装备提供创新的理论和具有源头创新的技术。为了建立一个系统的科研创新平台，学院积极挖掘资源，与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科教合作关系：

1. 建立“深圳市轨道交通重点实验室”。为满足深圳市及周边地区飞速发展的轨道交通对科学技术和高端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解决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和装备制造中的共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利用和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办学优势于2012年5月申报组建“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重点实验室”，并已获批。

2. 成立“深圳轨道交通院士工作站”。深圳轨道交通学院将积极通过引进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及其研发团队，联合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轨道交通产业联盟企业，设立并建设“深圳轨道交通院士工作站”，面向深圳市、香港地区、珠三角地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轨道交通产业若干重要基础理论方法、关键共性技术、使能技术等研究、开发、应用、产品化与产业化，以及轨道交通高端科研创新人才的培养。

3. 设立“深港轨道交通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与香港科

技大学工学院正式签署了协议共同组建和运作“深港轨道交通科技创新中心”。中心将在时机成熟时，联合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向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申报市级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地开展基础研究及其应用和产业推广工作，大力推动深港两地轨道交通业的发展。

在科教合作创新方面，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与深圳市地铁集团公司、深圳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及其成员企业、香港和大陆高校进行了各个领域的科技合作，并在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方面获得了合作方的支持。比如在与深圳市地铁集团公司的合作中，深圳地铁为轨道交通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将提供以下支持：（1）合作期间内（暂定为12年，2009.8-2021.8）每年为交通学院提供90万元奖学金、助学金（设立为高金额为1万元人民币的“铁魂奖学金”、“铁魂助学金”）及研究经费，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工作。（2）以地铁公司丰富的地铁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及完善的职业培训设备为基础，为学院提供实习实训设备、教学案例、培训计划、培训教材和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资源。（3）地铁集团每年接收一定数量（根据地铁公司当年的用人计划确定在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的招收人数，每年优先录用不少于百分之七十（70%）的毕业生）的轨道交通学院毕业生到地铁公司工作。

在与地铁公司进行产学研对接方面，双方在产学研领域形成了良好的对接机制，并取得了若干实质性进展：一是联合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采取项目委托、联合技术攻关、第三方项目合作等形式进行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推广，拟在3-5年内开展各类合作项目6-10项，科研到款超过300万元，实现科研成果转化1-3项，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000万元，并组织双方共同申报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项目。二是共建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重点实验室”，下设“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牵引与控制研究中心”、“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研究中心”、“城市轨道交通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全运行技术研究中心”等四个研究中心。三是联合培养人才，在联合办学和产学研对接方面，双方在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设置、实验与实践平台建设、学生就业、科研与技术开发项目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主要包括：校企双方共同商议确定专业方向的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环节等，制定出既满足学科特点，又满足企业需求的“宽口径、厚基础、多方向、强能力、求创新”的轨道交通人

人才培养模式。

深圳大学轨道交通学院期望在学院建设,特别是产学研对接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方面得到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制定长期的支持政策,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运行机制,以促进和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推动深圳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对于未来发展的具体思路是:一是支持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重点实验室、深圳轨道交通院士工作站、深港轨道交通科技创新中心和深圳轨道交通学院技术转移及产业孵化与产业化中心(以下统称为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在轨道交通领域的相关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使能技术的研发、产品化,突破国外垄断,推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产业引领作用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同时希望政府给予每个转移或孵化项目的资金支持。二是支持“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组建合营公司进行创业,根据当年投资项目情况和投资规模,争取按照5%-20%的比例获得风险补偿资金支持。三是支持“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各类轨道交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根据设备购置、实验室建设等资金投入情况,按照10%-50%的比例给予平台建设资金支持。四是为“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设立引进高端人才及其团队的基金,参照深圳市相关规定给予工作津贴、研修津贴、房租补贴等支持。五是支持“深圳市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平台”在轨道交通领域进行的深港合作、深港同城化方面的探索,给予每个项目20-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二)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成长与发展

2009年经教育部高教司评审通过,深圳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正式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这是传媒实验教学中心二十多年建设的成果结晶。深圳大学传媒实验教学中心长期以来秉承“素质为本,技能为用,学用贯通,创意实践”的传媒实验教学理念,以“创意实践”为枢纽,将素质、知识、技能三个要素有机整合。通过开放式、自主式开设实验教学科目,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引,以团体互动为纽带,以创意实践为育人平台,以成果产出和转化为目标的全方位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出大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水平、有特色的媒体创意人才。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积极适应深圳建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时代要求,按照国际化的高标准,构建全媒体创意人才的培养高地。从2005年至今,中心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每周进行社会舆情电话调查,

仅2009年以来，提供了213期分析报告；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每季度进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为全市广告经营单位进行广告监测培训；为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社会舆情调查、公共文明指数测评、数字化广告监测、宣传文化基金绩效评估、循环经济宣传推广、政府机构形象设计等服务；在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本中心指导近800位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于大运会主媒体中心，担负大运会多语种官方网站、新闻图片社、主媒体新闻发布会的业务助理，圆满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

在产学研基地建设方面，充分利用蓬勃兴起的深圳传媒和文化产业环境，与地方政府、主流媒体集团、全国示范性文化企业、网络新媒体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分别与中青合创传媒、天华世纪传媒、广信网络传媒合作建立了3个产学研基地；与深圳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深圳之窗网、深圳新闻网、中山日报集团、深圳市采纳营销公司等合作建立了60个实习基地；作为发起单位之“倡议成立了一深圳市移动互联网产学研联盟”。在经费投入方面，自2009年至今，获得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费50万元，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费150万元，本校配套经费190万元；另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专项经费250万元，深圳市配套经费200万元，本校配套经费50万元，实验室发展与提升计划经费274.3万元，新闻采编实验室建设费50万元，2009-2012年度常规经费417.6万元，社会捐助费30万元，总计1661.9万元。

对照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目标，中心还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和提升。

1. 实验教学场地有必要适当集中。由于我校生源迅速扩大，原有的教学场地紧张。目前本中心实验教学场地分散在校园内三个不同区域，不尽如人意。学校已经在校园南区划出新的地块，进行了规划设计，十二五期间将建成传媒—设计教学大楼，届时本中心实验教学场地将集中，并扩大为5000平方米。

2. 实验教学系列教材、网络化资源有待进一步扩充和提升。实验教学系列教材计划出版10种，目前只出版了3种。我们要加强目标管理，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实验教材出版计划，并开发更多的网络视频精品课程。

3. 深港教育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毗邻香港的地域优势，加强深港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人员互聘、项目合作、平台共建、资源同享，

通过深港合作机制推动实验教学国际化。

4. 需要重点投入的项目。按照中心指定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预期，十二五期间要完成的实验教学基础建设（硬件设备）的经费投入项目包括：（1）虚拟影视演播实验教学系统（2）多功能立体声教学播映厅（3）数字化音频节目制作系统（4）数字化摄影教学系统（5）融合媒体实验室系统（6）网络化媒资管理实验系统（7）社会调查及传媒效果监测实验教学系统（8）传媒教学多媒体资料库。

（三）“深圳现代设计博物馆”——“设计之都”的文化名片

设计和建立一座博物馆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支持和推动作用，这需要高校与文化事业单位的协同合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区，深圳的发展成就了一批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现代设计师，他们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竞赛与展览且成绩斐然，他们的作品受到国外设计界的好评。同时，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国内高校的大批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投身深圳设计业，使深圳成为中国设计业人才汇聚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12月深圳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并获得中国首个“设计之都”称号。为了促进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加快推动深圳“设计之都”的建设，打造深圳设计领域学术交流平台、成就展示平台、展览陈示平台和作品交易平台，深圳大学与深圳市“设计之都”推广办协商，于2012年5月正式成立了“深圳现代设计博物馆”，它由深圳市“设计之都”推广办与深圳大学联合创办。这是中国第一座现代设计博物馆，它将成为深圳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该博物馆的建立主要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专项基金投入150万人民币用于前期组建和首次展览，深圳大学给予了场地支持。

深圳现代设计博物馆的建立是为了宣传深圳智造、研究深圳智造、发展深圳智造，关注和推动深圳设计的发展方向，包括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数码、影像、动漫等各个设计领域。在服务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博物馆一方面致力于通过策划和举办专题展览、举行公开讲座、开展设计教育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个丰富多元的设计艺术平台；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和反映深圳设计与深圳发展、相关行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推出新生代的深圳设计人，主动寻找需求，成为深圳设计人与当地产业的纽带与桥梁；第三方面，通过组织

学术论坛和国内外交流学习活动，引进国内外先锋设计理念、发现和展示最新的设计思潮，发掘和培养深圳艺术设计人才，成为深圳设计师走出深圳、扩大影响的平台。

深圳现代设计博物馆是一座完全免费的公益性博物馆，实行免票制，对所有市民及游客开放。尽管博物馆已经正式对外开放，按照建馆规划的总投资3000万预算，目前在资金投入方面还存在很大缺口。根据建馆规划的要求，博物馆在库房、展厅、公共服务区、文物保护技术区、办公区等方面的场地面积还远远不够。目前展馆与库房是分开的，博物馆的展馆部分是在深圳大学科技馆的一楼展厅，库房却在另一个区域。预计新的设计大楼建成后，将会改善博物馆空间不足的问题，但这一切都需要后期资金的持续投入。

（四）“知识产权学院”的运作与困惑

一座城市的知识产权产出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深圳各类知识产权产出水平已位居全国领先行列，各种知识产权拥有量正稳步提高。但深圳市知识产权人才的“缺口”却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深圳的专利工程师、专利代理中介、律师等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知识产权领域发展的一大“短板”。例如，深圳市目前从事专利工程师一类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仅有1000多人，如果以研发人员按1%~4%配置知识产权人才比例的国际“通行标准”来计算，深圳目前约有20多万技术研发人员，按最低要求1%配置，深圳至少也应有2000人的专利工程师，因此现有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缺口”达1000人。若按较高标准配置，则深圳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缺口接近7000人。此外，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透露，深圳目前的数十家专利代理机构以及专利代理人员规模仅是北京的约五分之一，这直接导致很多深圳企业的专利申请，只能“舍近求远”，靠外地专利代理机构来办理。这种背景下，深圳市市场监管局2010年与深圳大学合作成立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培养深圳市各行各业需要的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人才。

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成立为高校与政府、企业、服务机构共建人才培养平台创立了新的办学模式。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打磨，知识产权学院于2012年10月决定正式开办知识产权研究生班，为深圳市培养知识产权方面的专业人才。研究生班的主导思想定位在：一是配备高端师资，选拔包括理论界和政府企

业界的优秀师资；二是设置真正有质量和吸引力的课程，培养出高端的实用人才。希望通过研究生班的开办，能够在深圳知识产权领域打造知识产权学院的优质品牌。截止11月30日，已报名29人，预计最终报名人数在35人到40人。由于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这个平台不具其他竞争优势，主要靠高端师资吸引学员，而高师资意味着高成本。根据深圳市财政局的学费收取标准预算，扣除学校提成的30%，如果在没有其他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要举办这样一个研究生班，按招收35人计算，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将出现463775元的资金缺口。该费用还不包括知识产权学院的日常管理成本。目前这个班即将举行开班仪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但面临的重大经费问题不得不让人忧心忡忡。

深圳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运作实践反映出我们现有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政府和学校应该形成相关政策和机制扶持这一项目的运行：

1. 改革体制。建立灵活多样的财政管理体制，针对不同性质的办学模式设立不同的办学收费标准，建议深圳市财委在财务管理方法方面放宽限制，只规定指导性收费标准。事实上，在与知识产权学院各理事单位和深圳市场监管局沟通过程中，我们提出的学费收取标准，市场监管局和各理事单位都完全同意，但在政府财政政策那里却行不通。政府财政对于教育收费标准的确立，应该分清不同办学行为所达到的办学目标的差异性。属于满足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的“教育行为”，则应该坚持教育公平原则，实行低收费甚至免费的义务教育；属于满足高层次特殊教育需求的“市场行为”，则应该坚持效率原则，实行按市场需求关系确定收费标准。

2. 盘活机制。建议学校加大对代表学校创品牌和声誉的项目进行政策倾斜。同时必须尽快解决知识产权学院的人事问题。校内管理机制不完善，学校内部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滞后，对于学院在开拓新项目、为社会服务方面不仅没有什么鼓励措施，反而以扣除高达30%的管理费来制约项目的运作和发展，反映了学校管理层落后的思想和观念。

3. 人性化管理。建议学校充分考虑老师的处境，在财务报销方面进行人性化管理。建议财务处人员走出去见见世面，到华政、华科大考察学习。

三、经验与困境

（一）经验

通过对深圳大学各学院和相关机构的广泛深入调研，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年来，一直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文化的社会职能紧密联系起来办学，这对促进城市的教科文事业融合发展起到了实质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作为地处改革前沿的特区大学，深圳大学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下，从教育发展的实践层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在以高校为主体的教科文事业融合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1. 高校办学要有资源依赖的理念，尤其要夯实财力资源的基础。要善于主动吸取、合理整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争取的资源。现代大学只有在资源充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大学的各项社会职能，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关注政策，研究政策，准确把握城市发展和行业竞争的变化态势，主动寻求和开发与政策支持相吻合的开发项目，使高校在城市发展中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3. 善于捕捉城市发展的行业亮点，以高度敏锐的洞察力把握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需求，既要关注薄弱领域，又要重视优势发展，结合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主动与各方力量联合发展，打造全新的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品牌，实现教育与文化、教育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4. 汇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增强自身实力，形成团队优势。任何类型的合作都是互赢共利的联合体，只有打造强势的人才和团队，才能具备与别人合作的资本。

（二）问题与困惑

1. 财政投入缺乏效益观。地方财政对于本市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缺乏系统的规划，因而投入目标不明确，投入对象相对分散。尤其对本土高校的投入不够，舍近求远，盲目追求名校效应，很多投入不仅没有落到实处，反而不问投资回报地盲目合作、盲目投资，假借各种合作办学、引进名校、项目合作的名义，地方财政在教育领域的许多投资实际上对于本地高等教育发展和城市建设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自己的“孩子”不够吃，反而领养了很多别人的“孩子”，调研中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比如近期在深圳举办的首届高等院校艺术设计大赛，深圳政府投入1200万，而深圳大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申请到在本校举办其中的一个论坛的资格。类似这类巨额投资有很多，地方财政应该有效益观念，投资是否对地方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能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2. 人文社科领域的资金投入相对欠缺。同样是做研究，人文社科领域的项

目花了大量时间、人力和智力，获得的经费支持却与自然科学领域项目的经费数量差距巨大。一些社科类的教科文融合项目的经费使用上，规定不能用于支付劳务费，这严重阻碍了人文社科类项目的运作。人文社科领域的项目运作很多需要通过召开研讨会、举办作品展、组织调研、发放问卷、邀请专家做学术交流等人力劳动的大量付出，大量的工作可能很难用数字展示。校内很多文科项目经费很难以财务部门规定的名目进行正常使用和报销，制约了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科研积极性。

3. 财政经费的管理刚性过强、灵活不够，针对不同性质的项目缺乏分类管理，没有差异对待的细化标准，在资金的使用上管得过死，限制太多，出现一些不合理现象，影响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项目工作的持续开展。

4. 财政投入的政策支持渠道过于单一，混淆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类型项目的差异性，对于什么属于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机制运行建设、人才基金建设等没有清晰的认识和区别对待，对于什么项目应该长期资助，什么项目应该一次性投入缺乏理性思考和科学规划，因此出现一些投入与需求不相吻合的状况。

四、改革与建议

以产学研结合为基础促进财政支持教科文协同发展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综合性工作，单靠政府或高校某一方面的力量不可能解决其中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政府、高校、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等各方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完成这项社会使命。

（一）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教育是科技和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教科文融合的基础。支持教科文事业融合发展就应该从支持教育发展做起，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不可能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就不可能有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振兴。要用长期观念办教育，不能用办企业的方式办教育，即不能用投资企业的理念和方式来投资教育。尊重教育规律是实现教科文融合发展的基础。

（二）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地方财政要对深圳市的教育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确立每一阶段的重点发展目标，实施重点投入，提高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率。尤其要重视对本土高校的实质性支持和投入，要保证财政投资的回报扎扎实实地落实在为本地教育发展和城市建设服务上。

（三）分类管理，多元投入。拓展公共财政的政策支持渠道，厘清教科文融合发展中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合作模式，按照项目的不同需求进行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扶持。建议按照平台建设（长期性、整合性）、项目建设（阶段性、专业性）、机制运行建设（保障性）、人才基金建设（激励性）的不同特点实施分类管理和多元投入。还可针对教科文融合发展项目的实施效果和社会影响力，增设成果奖，或对实施教科文事业融合发展的单位和组织设“立示范单位”奖。

（四）适度加大对人文社科项目的支持力度，调整目前人文社科项目投入经费与自然科学项目投入经费之间的巨大差距和严重不平衡。人文社科领域的成果所具备的社会效应可能是隐性和潜在的效应，但对人类的贡献却是自然科学无法达到的。人文社科领域的项目运作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应该尊重两者的差异，但同时不能忽略人文社科的特殊性。

（五）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政府部门应深入基层开展经常性的调研和咨询，了解基层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政策认识水平和政策研究水平。尽可能吸收教科文各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参与政策研究和制定，出台符合客观规律和人性化的财政财务政策。

（六）加强政府对项目评审和认证的监管，建立专业的认证评审机构，防止专项资金申报中的腐败寻租现象发生，保证国家财政投入的科学性和公平性。逐步实现将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之中，不断提高监督检查的综合效能。

（七）不断完善教科文融合发展的组织建设和体系建构，做到从组织上层层落实、从政策上全面保障、从管理上严格执行。建议由一位副市长专门负责融合发展的工作，分管教科文的各局联合成立办公室，使这项工作有专人和专门的机构负责执行。

（本文作者王燕华系深圳大学高教所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

一、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

2013 年 1 月 9 日，中国校友会网正式发布《2013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连续 11 年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见表 1。

表 1：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

名次	学校名称	所在地区	类型	总分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综合声誉
1	北京大学	北京	综合	100.00	93.36	100.00	100.00
2	清华大学	北京	理工	98.25	100.00	87.15	90.06
3	复旦大学	上海	综合	82.51	56.39	53.53	53.53
4	浙江大学	浙江	综合	82.18	53.42	50.14	65.00
5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综合	79.72	58.88	36.50	49.46
6	南京大学	江苏	综合	78.71	44.45	43.52	53.26
7	中山大学	广东	综合	75.00	41.64	29.38	41.61
8	吉林大学	吉林	综合	74.95	37.63	36.36	32.97
9	武汉大学	湖北	综合	74.80	36.03	35.33	37.50
10	中国科技大学	安徽	理工	74.11	35.61	27.94	47.60
11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理工	73.52	38.06	28.44	31.03
12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综合	72.36	17.32	41.72	32.52
13	四川大学	四川	综合	72.31	30.93	28.67	30.58
14	南开大学	天津	综合	71.96	30.13	26.37	33.39
15	山东大学	山东	综合	71.81	28.18	27.54	33.20
16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师范	70.98	24.43	27.37	30.85
17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理工	70.68	26.80	25.23	25.68
18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综合	70.55	26.64	24.80	25.31
19	中南大学	湖南	综合	70.54	27.62	23.80	25.24
20	厦门大学	福建	综合	70.43	26.26	22.82	29.69
21	东南大学	江苏	综合	68.96	24.89	18.15	23.26

22	同济大学	上海	理工	68.92	24.28	18.16	24.21
23	天津大学	天津	理工	68.56	20.75	19.09	25.43
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理工	68.36	24.76	16.02	20.04
25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理工	67.77	20.03	15.28	25.43
26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师范	67.73	17.67	18.54	22.36
27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	理工	67.61	19.14	14.81	26.53
28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农林	67.05	18.09	13.64	23.85
29	湖南大学	湖南	综合	66.41	13.57	15.00	22.37
30	兰州大学	甘肃	综合	66.35	13.69	13.17	25.81
31	重庆大学	重庆	综合	65.88	13.62	13.04	19.26
32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理工	65.87	13.99	12.55	19.42
33	东北大学	辽宁	理工	65.80	13.38	13.54	17.45
34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理工	65.77	13.09	12.64	20.14
35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理工	65.76	15.92	8.98	22.10
36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	医药	65.33	14.18	11.25	14.32
37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师范	65.27	13.15	10.27	18.60
38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理工	65.20	11.00	12.05	18.48
39	中国地质大学	湖北/北京	理工	64.77	10.37	9.98	19.02
40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理工	64.66	12.79	8.11	16.04
41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师范	64.62	10.94	9.91	15.48
42	西北大学	陕西	综合	64.59	11.22	9.99	13.98
43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北京	理工	64.55	11.77	9.01	14.49
44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农林	64.52	12.80	7.61	15.17
45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	理工	64.47	10.72	8.38	17.77
46	长安大学	陕西	理工	64.17	13.11	7.91	8.29
47	东华大学	上海	理工	64.15	13.70	5.34	13.09
48	西南大学	重庆	综合	64.13	8.93	9.33	14.76
49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综合	64.09	10.22	7.03	16.77
5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理工	63.96	10.11	7.30	14.48
51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理工	63.89	9.49	6.55	17.00
52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理工	63.84	7.40	8.65	16.16
53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理工	63.80	9.00	6.61	16.66
54	苏州大学	江苏	综合	63.79	10.36	6.83	12.54
55	中国石油大学	山东/北京	理工	63.77	8.51	7.13	16.17
56	云南大学	云南	综合	63.67	7.58	8.69	13.07

57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理工	63.62	10.00	4.64	16.49
5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	理工	63.62	9.66	7.28	10.57
59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农林	63.59	7.19	6.84	17.56
6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农林	63.58	8.69	6.92	13.35
61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师范	63.57	6.40	9.98	11.16
62	上海大学	上海	综合	63.49	7.85	7.39	13.00
63	郑州大学	河南	综合	63.40	6.46	8.85	11.40
64	河海大学	江苏	理工	63.37	7.55	6.38	14.60
65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	理工	63.22	9.51	4.35	12.54
65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理工	63.22	8.06	4.86	14.91
65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	理工	63.22	6.24	7.11	13.84
68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师范	63.21	6.08	8.60	10.11
69	暨南大学	广东	综合	63.04	6.78	6.79	10.53
70	福州大学	福建	理工	62.93	7.80	5.14	10.55
71	南昌大学	江西	综合	62.87	8.22	5.09	8.63
72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	林业	62.84	5.54	5.25	14.79
73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理工	62.73	6.61	5.59	9.42
74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师范	62.66	4.58	7.16	9.53
75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师范	62.62	5.43	7.29	6.41
76	江南大学	江苏	综合	62.47	6.77	2.85	12.28
77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	农林	62.40	6.51	5.60	4.68
78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	医药	62.39	8.03	4.34	3.91
78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政法	62.39	2.30	5.66	15.20
80	新疆大学	新疆	综合	62.29	5.27	4.41	9.33
81	广西大学	广西	综合	62.22	5.38	4.08	8.92
82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综合	62.18	5.08	4.41	8.22
83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理工	62.15	5.68	3.34	8.99
83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	财经	62.15	2.94	5.45	10.50
85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民族	62.10	2.59	4.83	12.30
86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	医药	62.09	6.91	3.80	3.67
86	山西大学	山西	综合	62.09	5.53	6.21	0.93
88	河南大学	河南	综合	62.08	5.21	5.74	2.81
88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	理工	62.08	4.97	4.52	6.62
9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财经	62.06	2.70	6.57	6.90
91	安徽大学	安徽	综合	62.04	3.99	4.70	8.22
91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医药	62.04	5.94	4.12	4.59
93	湘潭大学	湖南	综合	61.99	5.50	4.29	4.58

94	贵州大学	贵州	综合	61.95	4.87	3.65	7.31
95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	医药	61.94	5.82	4.49	2.46
95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	理工	61.94	5.89	4.42	2.42
97	燕山大学	河北	理工	61.91	5.72	3.92	3.72
98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	理工	61.90	5.63	4.19	3.14
99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林业	61.89	4.13	4.55	5.91
99	辽宁大学	辽宁	综合	61.89	1.99	6.10	7.35
101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	理工	61.87	6.22	4.49	0.40
102	扬州大学	江苏	综合	61.85	4.98	4.53	3.16
102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医药	61.85	5.52	4.21	2.59
104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财经	61.83	2.08	3.32	13.59
105	海南大学	海南	综合	61.81	5.53	2.52	6.43
105	江苏大学	江苏	综合	61.81	4.68	4.18	4.25
105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	财经	61.81	1.83	6.01	6.87
108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师范	61.65	3.81	5.34	1.02
109	宁夏大学	宁夏	综合	61.64	5.17	1.67	7.01
1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财经	61.63	2.61	3.38	8.97
111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医药	61.59	3.02	3.38	7.39
112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医药	61.58	3.74	2.17	8.50
113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师范	61.57	3.75	4.97	0.98
113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综合	61.57	2.92	5.65	1.41
115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师范	61.54	2.67	5.11	2.89
116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师范	61.53	3.52	4.33	2.65
117	深圳大学	广东	综合	61.46	5.09	2.62	2.06
118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农林	61.44	3.89	3.88	1.54
118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政法	61.44	2.05	5.00	3.29
120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	农林	61.42	3.02	2.91	5.93
121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	医药	61.41	4.33	2.71	2.99
122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师范	61.37	2.60	4.17	2.99
122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	医药	61.37	2.39	2.33	8.36
124	河北大学	河北	综合	61.36	2.63	4.33	2.32
125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语言	61.35	1.29	3.10	8.90
126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农林	61.33	2.42	2.99	6.04
127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	理工	61.31	2.72	2.62	5.94
128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师范	61.30	3.18	3.35	2.64
128	石河子大学	新疆	综合	61.30	5.65	1.40	1.33
128	延边大学	吉林	综合	61.30	2.39	2.48	7.00

131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	财经	61.29	2.08	5.15	0.54
131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师范	61.29	3.00	3.63	2.16
133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理工	61.27	1.35	2.59	8.93
133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师范	61.27	3.43	3.09	2.15
135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理工	61.15	3.89	1.88	2.35
135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理工	61.15	2.41	3.93	0.86
13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理工	61.14	3.52	3.00	0.25
138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农林	61.10	3.16	2.97	0.58
138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	农林	61.10	2.57	3.28	1.31
140	宁波大学	浙江	综合	61.09	4.20	1.14	2.55
141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	医药	61.08	2.43	1.50	6.12
141	青岛大学	山东	综合	61.08	3.25	2.73	0.77
143	湖北大学	湖北	综合	61.07	2.20	3.17	2.21
144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	农林	61.06	2.80	3.19	0.39
144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理工	61.06	3.00	2.92	0.61
146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	理工	61.05	3.01	3.04	0.17
147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语言	61.04	0.79	1.96	8.44
147	武汉科技大学	湖北	综合	61.04	2.66	2.92	1.16
149	沈阳农业大学	辽宁	农林	61.02	1.64	3.19	2.84
150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医药	61.01	3.83	1.94	0.27
151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	师范	60.99	2.58	2.18	2.50
151	汕头大学	广东	综合	60.99	2.90	1.82	2.71
153	青海大学	青海	综合	60.96	2.41	0.48	6.92
154	西藏大学	西藏	综合	60.95	2.35	0.51	6.97
155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师范	60.94	2.90	2.43	0.41
156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理工	60.93	3.67	1.58	0.32
157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理工	60.92	2.47	1.81	2.75
157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师范	60.92	1.81	3.30	0.64
159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师范	60.91	2.52	1.94	2.12
160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师范	60.90	3.25	1.78	0.46
161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	医药	60.89	3.14	1.39	1.72
161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	理工	60.89	3.29	1.61	0.67
163	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	理工	60.88	2.83	2.20	0.22
163	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	理工	60.88	3.55	1.47	0.16
165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林业	60.87	1.82	3.02	0.51
166	华侨大学	福建	综合	60.86	2.27	1.80	2.35

166	江西农业大学	江西	农林	60.86	2.06	1.98	2.52
166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理工	60.86	3.74	1.00	0.68
169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	理工	60.84	2.59	2.12	0.37
169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师范	60.84	1.30	2.96	1.61
171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理工	60.82	2.48	2.16	0.25
172	中北大学	山西	理工	60.81	2.96	1.64	0.31
173	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	理工	60.80	1.56	2.19	2.32
173	哈尔滨理工大学	黑龙江	理工	60.80	2.36	2.24	0.17
175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	农林	60.79	1.94	2.45	0.42
175	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	医药	60.79	1.38	2.68	1.37
175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	财经	60.79	1.51	2.79	0.70
178	温州医学院	浙江	医药	60.78	3.27	0.83	1.21
179	广东工业大学	广东	理工	60.77	2.11	1.81	1.40
179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医药	60.77	2.18	2.04	0.59
179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农林	60.77	3.19	1.20	0.30
182	沈阳工业大学	辽宁	理工	60.76	2.64	1.66	0.31
182	沈阳药科大学	辽宁	医药	60.76	1.06	2.33	2.60
184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辽宁	理工	60.75	1.30	2.16	2.33
185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	农林	60.73	1.90	2.21	0.27
186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师范	60.72	1.42	2.58	0.43
18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江苏	理工	60.72	2.16	1.07	2.49
186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	理工	60.72	2.21	1.92	0.17
189	广州大学	广东	综合	60.70	2.39	1.14	1.40
189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	理工	60.70	2.35	1.57	0.34
18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财经	60.70	0.70	3.16	0.43
192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医药	60.69	2.15	1.79	0.21
192	新疆医科大学	新疆	医药	60.69	2.58	1.37	0.20
194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	农林	60.68	1.91	1.79	0.60
195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医药	60.66	1.62	2.09	0.30
196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师范	60.65	2.50	0.99	0.76
196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师范	60.65	1.36	2.02	0.93
196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财经	60.65	2.15	1.33	0.76
199	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	师范	60.64	0.88	2.23	1.55

200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医药	60.62	2.23	1.27	0.25
200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理工	60.62	2.48	0.63	1.27
202	广州医学院	广东	医药	60.60	2.33	0.81	0.97
202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师范	60.60	1.58	1.42	1.27
204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政法	60.59	0.79	2.40	0.64
205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财经	60.58	0.48	2.73	0.36
20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	林业	60.58	1.52	1.73	0.23
207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	理工	60.57	2.70	0.64	0.01
20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	理工	60.57	1.96	1.19	0.41
207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	农林	60.57	1.48	1.74	0.17
210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综合	60.56	1.85	1.21	0.44
210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师范	60.56	1.59	1.50	0.33
212	济南大学	山东	综合	60.55	1.82	1.21	0.44
212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	师范	60.55	1.00	2.11	0.26
212	南华大学	湖南	综合	60.55	1.97	1.14	0.20
212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	理工	60.55	2.40	0.68	0.27
216	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	医药	60.54	1.39	1.33	1.05
216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	医药	60.54	1.36	1.66	0.23
218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	理工	60.53	1.41	1.58	0.25
219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	理工	60.52	1.37	1.59	0.16
219	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	农林	60.52	0.85	1.26	2.35
219	新疆农业大学	新疆	农林	60.52	1.78	1.14	0.20
222	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理工	60.51	1.28	1.58	0.30
222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	医药	60.51	1.05	1.38	1.40
222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	理工	60.51	1.64	1.25	0.25
225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	农林	60.50	1.28	1.58	0.15
22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语言	60.50	1.11	1.55	0.69
225	景德镇陶瓷学院	江西	理工	60.50	2.22	0.57	0.27
225	温州大学	浙江	综合	60.50	1.33	0.93	1.69
258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林业	60.40	1.85	0.44	0.13
277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医药	60.32	0.99	0.86	0.01
296	浙江财经学院	浙江	财经	60.26	0.76	0.64	0.27
342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师范	60.18	0.50	0.51	0.16
347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	农林	60.17	0.87	0.06	0.12
377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	师范	60.12	0.62	0.06	0.07

427	丽水学院	浙江	师范	60.08	0.43	0.00	0.06
427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	理工	60.08	0.41	0.01	0.09
438	嘉兴学院	浙江	综合	60.07	0.25	0.10	0.13
453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理工	60.06	0.26	0.04	0.10
467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	理工	60.05	0.20	0.07	0.13
482	台州学院	浙江	综合	60.04	0.13	0.06	0.06
590	衢州学院	浙江	理工	60.01	0.00	0.00	0.11
590	浙江警察学院	浙江	政法	60.01	0.04	0.01	0.05
590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	语言	60.01	0.07	0.00	0.00
654	公安海警学院	浙江	政法	60.00	0.00	0.00	0.00

二、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行榜中温州大学 2007-2013 年排名

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行榜中温州大学 2007-2013 年排名见表 2 所示。

表 2：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排行榜中温州大学 2007-2013 年排名

年度	全国排名	总分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综合声誉
2007	280	0.55	0.32	0.86	0
2008	287	0.56	0.26	0.77	1.16
2009	293	0.57	0.32	0.72	1.19
2010	285	0.69	0.3	1.02	1.08
2011	285	0.66	0.31	0.99	0.73
2012	252	0.89	0.98	0.93	0.36
2013	225	60.50	1.33	0.93	1.69

三、评价指标设计原则

“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在评价体系设计和指标遴选上，坚持系统性、公正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等四大原则。为保证公正、客观和系统地评价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体现出被评价高校的历史成就与现时能力状况。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在评价指标遴选上采用“金字塔”原理和“新闻洞”理论，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严格筛选出高层次的、具有标志性和权威性的反映

高校质量指标和持续性的指标集，确保最终遴选出的评价指标具有简洁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可重复验证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

1. 系统性原则。大学评价必须用若干指标进行衡量，指标间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同一层次指标尽可能的界限分明，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同时保证评价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有明确的内涵和科学的解释，要考虑指标遴选、指标权重设置和计算方法的科学性。

2. 公正性原则。确保被选择的指标具有可比性，可比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前提，符合可比性条件要求的指标是通过国家和社会权威机构、遵循严格程序和评选标准确定的人和事物，确保评价指标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同时又能反映高校的客观实际情况。

3. 可操作原则。确保被选择的指标简单、实用、可重复验证。评价操作尽量简单方便，但保证数据易于获取，且不能失真。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繁简适中，计算方法简单可行，在基本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全面性的前提下，指标体系尽可能简化，减少或去掉一些对结果影响甚微的指标。严格控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评价结果他人可以按照同样的程序复核。

4. 导向性原则。确保被选择的指标具有持续性、导向性功能。大学评价的目的不是单纯评出大学的名次及优劣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引导被评高校能比较客观地了解 and 把握本校的特色、优势、劣势，鼓励被评高校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向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发展，特别是向着社会 and 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和目标发展，以此体现并发挥大学评价工作对高校发展的导向功能。

四、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采用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由“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综合声誉”三个指标构成。“二级指标”由科研基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培养基地、师资队伍、杰出校友 and 综合声誉构成。“三级指标”由科学创新基地、基础科研项目、重大科研成果、杰出人才、师资水平、学科水平、国家定位、校友捐赠 and 社会声誉等指标构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认为凡是涌现出能比较持续地反映高校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高等级质量指标都将成为我们评价大学的依据。

表 3：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人才培养	杰出校友	杰出人才	20.65%
	师资队伍	师资水平	12.90%
	培养基地	学科水平	8.82%
科学研究	科研成果	重大科研成果	20.43%
	科研基地	科学创新基地	9.46%
	科研项目	基础科研项目	11.83%
综合声誉	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	7.53%
	国家定位	国家定位	2.15%
	社会声誉	媒体关注	3.23%
		校友捐赠	3.01%

五、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各级评价指标的内涵

1. “杰出校友”是指高校毕业生中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和优秀博士等。

(1) “杰出政界领袖”是指 2000 年以来国家级正副职领导、省部级等正职领导，第十四届-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等。

(2) “杰出企业家”是 1999-2012 年胡润、福布斯和新财富等中国富豪榜上榜企业家；上市公司、中央直管企业、国有重点企业董事长、总裁/总经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长、行长等企业领导者。

(3) “杰出科学家”是 1955-2011 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杰出人

文社会科学家和长江学者及创新团队带头人等。（“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遴选标准和入选学者名单详见《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

（4）“优秀博士”是指 1999-2012 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含提名奖）和 2010-2011 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获得者等。

2. “师资水平”由 1955-2012 年申报并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外院士、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团队、千人计划入选者、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学者及创新团队带头人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组成。

3. “学科水平”由“高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 计划)”、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一二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硕士点和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等组成。

4. “重大科技成果”包括国家级奖励成果、国家级专利、标准和著作奖励和国际高水平论文等。

（1）“国家级奖励成果”是指 1978-2011 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励的统计时间为 2000-2011 年；1997-2012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奖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原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1998-2012 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奖；199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995-2009 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国防院校科研特殊贡献等。

（2）“国家级专利、标准和著作奖励”是指中国专利奖、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等组成。其中，中国专利奖统计时间为 2001-2012，其中专利金奖为 1989-2012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统计时间为 2006-2011 年；国家级图书奖统计时段：国家图书奖为 1993-2005 年，中国出版政府奖为 2008-2011 年。

（3）“国际高水平论文”是指“Nature&Science 论文”和“ESI-TOP 论文被引频次”组成。“Nature&Science 论文”是指 1998-2012 年中国高校师生在《英国的《自然》(Nature)与美国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ESI-TOP 论文”是指中国高校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特定学科领域和年限中的被引频次排

名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 世界前 1%的论文,统计时间为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5. “基础科研项目”由 1998-2012 年 973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成。

6. “科学创新基地”包括知识生产基地、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

(1) “知识生产基地”由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防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教育部(含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教育部(含省部共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组成。

(2)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基地”由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和国家大学科技园等组成。

7. “综合声誉”由学术声誉、国家定位和社会声誉等。

1) “学术声誉”是指进入“ESI 论文被引用频次居世界前 1%”的中国大学被收录的论文,统计时间为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国家定位”是指高校是否为 985 工程大学(含 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11 工程大学、国家重点大学和国家重点建设西部地区高校,是否设有研究生院等。

3) “社会声誉”由校友捐赠和媒体关注组成。“校友捐赠”是指 1990-2012 年中国大学 1952 年(含)以后毕业校友、在读学生和教师捐赠的总额;单笔捐赠金额在 10 万以上。“媒体关注”是指最近 3 年国内新闻媒体对大学的新闻报道,统计时间为 2010-2012 年,新闻检索工具为百度新闻搜索。

六、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计算方法

本排行榜最终综合评价和单项评价结果均归一化处理以百分制分数形式给出。

计算方法

1. 三级评价指标得分的计算。

计算公式：上榜高校的三级评价指标得分=100 × Σ （各三级评价指标参数 × 系数） / MAX（ Σ （各三级评价指标参数 × 系数））

2. 一/二级评价指标得分的计算。

计算公式：上榜高校的二级评价指标得分=100 × Σ （各三级评价指标得分 × 权重） / MAX（ Σ （各三级评价指标得分 × 权重））

计算公式：上榜高校的一级评价指标得分= 100 × Σ 各二级评价指标得分 / MAX（ Σ 各二级评价指标得分）

3. 综合排名得分的计算。

计算公式：上榜高校的最终综合排名得分=60+40 × Σ （三级评价指标得分 × 权重） / MAX（ Σ （三级评价指标得分 × 权重））

七、2013 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对象及数据来源

中国校友会网《2013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评价对象为教育部 2012 年度批准并公布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公立和私立本科院校。由于本评价报告对中国两岸四地高校的综合择优排序，对评价指标数据覆盖不到的高校，课题组暂不做评价。

自 2003 年起，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数据全部采用公开数据，任何人均可通过国家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门相关网站、高校网站、媒体报道和报刊杂志书籍等公开渠道获得；其中，指标数据基本上为高校 2012 年度的相关办学指标数据，部分为截至 2011 年数据。但是由于在数据的调查整理过程中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采用的数据可能存在疏漏之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取调查数据的调查对象，基于宁缺勿滥的原则，本次报告暂不统计，等获取确切数据后再纳入调查报告中。

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52——2002)

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

一、导言

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本文利用一所中央直属精英大学和一所省属精英大学的数据证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子女受惠于国家政策开始成比例进入两所精英大学，进入改革时期后，虽然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到2002年前两所学校中的工农子女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这些学生来自非精英家庭，是中国教育领域内这场无声革命的最大成果和集中体现。

1949年以前，普通民众只在理论上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终能进入精英教育体本是有条件的少数人。如明清的科举制，其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参加科考还需经历长期知识准备，一般家庭子女很难做到。这导致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都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目前主流学界认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科举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近代以来大学成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权势、财力所垄断的局面并未改变。高等教育规模有限，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的比例。各级教育均未普及，学习成本高昂，绝大多数适龄青年由于知识与经济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学门外。1929年有研究者对中央大学182名大学生调查后感慨道：试问一般工人和农民家庭，哪有这种剩余财富供儿女们上这样的大学？多项社会调查和学人回忆也都表明民国大学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

1949 年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国教育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是基础教育得到大力扩展。此前中国仅有 3% 的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教育，成为大学选材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21 世纪初已有超过 50% 的适龄人口能接受高中教育，比例提升了十多倍。全国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几率也从 0.1% 提升到 15% 左右，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只能从极小比例人口中选拔高等人才的传统。有学者认为，1949 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努力，体现了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理念。

其次，国家制定统一标准，组织大学考录工作。考生不用出本区县就能参加考试，大大降低了应试成本，方便普通考生的参与。高校长期不收费或低收费，甚至给予学生补贴，使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工农子女不仅能考上大学，还能上得起大学。

最后，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了各种“出身照顾”政策，要求大学优先招收工农等阶层子女，加快推动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化，工农群体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成规模出现。

考察 1949 年以来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内容。一直以来，高等精英教育的开放与公平受到社会和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定期公布大学生源的分布状况，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通常做法。如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自 1966 年起，每年都会整理公布大量有关美国高校新生的家庭状况资料，这些做法在中国还付诸阙如。有效数据的缺乏，给研究和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社会来源带来了困难。

二、研究资料描述

从 2003 年起，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根据各自档案馆所存的学生学籍卡，建立了本科生信息电子数据库。两校的数据库共有约 15 万本科毕业生的资料。北京大学的数据库有 64510 个个案，包括 1952-1955 年、1972-1987 年以及 1989-1999 年各年的学籍材料；苏州大学的数据库有 86393 个个案，包括 1933-1965 年和 1972-2003 年各年的学籍材料，本文的分析计算只包括 1952-2002 年的数据。

在这两所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将两校共约 15 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两校共有数百个不同的院系专业、8000 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学生父母（家长）

职业，5 万多个不同书写名称的入学前学校。此外，家庭居住地址约有 12 万 9 千多个，由于数量太大，因此编写了相应程序来区别学生居住地的城乡属性。

根据学籍卡数统计，两校在 1952-2002 年间，招生规模有所扩展。早期学籍卡可能有少部分缺失，但基本可以反映各时期学校招生量的变化情况。北京大学 1952 年的数据包括院系合并后从其他学校转入的学生；“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每年招生数在 1000-2300 人左右；1977 年恢复高考，招生数为 1000 多人；除了 1989 年、1993 年受特定社会事件影响，北京大学每年招生量基本在 2000 人左右；1990 年代中期开始每年在 2500 人左右；1999 年全国大学扩招，但北京大学当年招生数没有明显增长。苏州大学在 1977 年以前，每年基本只招几百人。1977 年起，每年招生人数在 2000 人左右；自 1995 年起，苏州大学先后合并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和苏州丝绸工学院，1996 年开始招生数量明显增加。1999 年扩招和 2000 年合并苏州医学院，苏州大学招生数量一度超过 6000 人/年。如果扣除学校合并带来的招生增加，苏州大学实际增加的招生量约在 1000 人/年。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50 年内，中国精英大学入学规模的增加幅度一直不大，远低于全国人口自 1950 年以来约 3 倍左右的增长。

北大 (北京大学简称)和苏大 (苏州大学简称) 分别是全国和江苏省的精英大学。北大历来是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性大学之一，也是历年高考招揽各地优秀学生最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之一。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按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内地大学排名，苏州大学基本在 40 名以内，呈逐年上升趋势。扩招前的 1998 年，全国共有大学 1022 所，到 2006 年，也就是实行扩招 7 年后，全国共有大学 1867 所，以此计算，苏州大学的位置处在前 4%。

两校隶属关系不同，招生范围存在明显区别。北大是教育部属高校，招生面向全国，实行配额制，但各省市配额并不均衡，比如北京的配额远高于外地。总共 64500 多名的北大学生中有 57628 人可确定其来源省，其中，北京生源 15561 人，占可识别来源省区学生数的 27%以上，排第二位的江苏省生源仅占 5.3%。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大学，省外学生比例不高。在苏大可识别来源省区的学生中，80.6%的学生来自江苏省，来自四川省的学生排名第二，仅有 2.4%。1982 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名苏州大学之前，江苏省生源占到 96.2%。苏州大学是比较地方化

的院校。

两校招生分数线也不同，能够进入两所学校的学生在整个考生中所处位置存在较大差距。2003 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分数线为文科 590，理科 600 分。当年北京理科高考成绩 600 分以上的有 760 人，处在全体北京理科考生的前 1.45%，文科 600 分以上的有 89 人，处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 0.31%，加上 590 分以上的，当在全体文科考生的前 0.4%左右，综合起来约在全体考生的前 1%。同年北大在江苏理科录取线为 636 分，当年江苏 630 分以上的理科考生约有 307 人，处在江苏全体理科 310082 名考生的前 1%以内，竞争程度远高于北京考生。2003 年苏大在江苏理科招生分数线 522 分，当年江苏考生成绩在 520 以上的有 28083 人，处于江苏全体理科考生的前 9%左右。

北大和苏大存在着诸多差异，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两校的差别形成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本研究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总体状况，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50 年来高校招生政策虽然有很大变动，但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指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中国各所大学虽然差别很大，但同档次的学校由于招生分数线或招生标准相似，在同一省区内的新生源具有相似性。从这个角度，北大和苏大的学生来源，不仅能代表各自学校类型的特点，还可以代表全国或江苏同等分数段考生的情况。两所学校学生来源的社会构成的任何变化不仅反映两所学校自身招生政策或学生来源的变化，也会反映全国或江苏高考考生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社会的某些整体性变化。

三、研究发现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分析了两所学校学生社会来源在 1952 年到 2002 年间的变化。首先描述历年两所学校学生的城乡比例与变动趋势，然后分析两校学生父母的职业构成与变化，最后，探讨两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与分布，包括来自重点与非重点中学学生的比例。

(一)城乡比例及其变动趋势:对家庭居住地的分析

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本文区分城乡的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是因为自 1990 年代以来,户籍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户籍地长期居住在城镇,在江苏省尤其明显。所以,用户籍区分学生的城乡来源没有用居住地址区分符合实际。1950 年以来两校共有学籍卡 145312 张,其中填写了家庭地址的共 127378 份,占总体的 87.7%。我们设计了相应程序,将这些地址分为城市、乡镇与农村三类。本文对农村的定义偏严格,对乡镇和城市的定义偏松,可能会导致农村生稍少于实际人数,乡镇和城市人数略多于实际人数。

填写城市地址的学生占有所有填写地址学生的比例,在北大是 79.91 %;在苏大是 46.33 %。图 1 是 1952 年以来两校学生地址分城、镇、村的比例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 1950 年代初,近 9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全国约 80 万个村庄中,但两校几乎没有学生来农村,来自县镇的也很少。1952-1955 年间,北大农村地址学生的比例从 2.4%增长到 6.5%。到 1980 年,这一比例增长到 12.8%, 1985 年更是一度达到 19.4%。1990 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 12 %-15%左右,乡镇地址的学生比例超过 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 20%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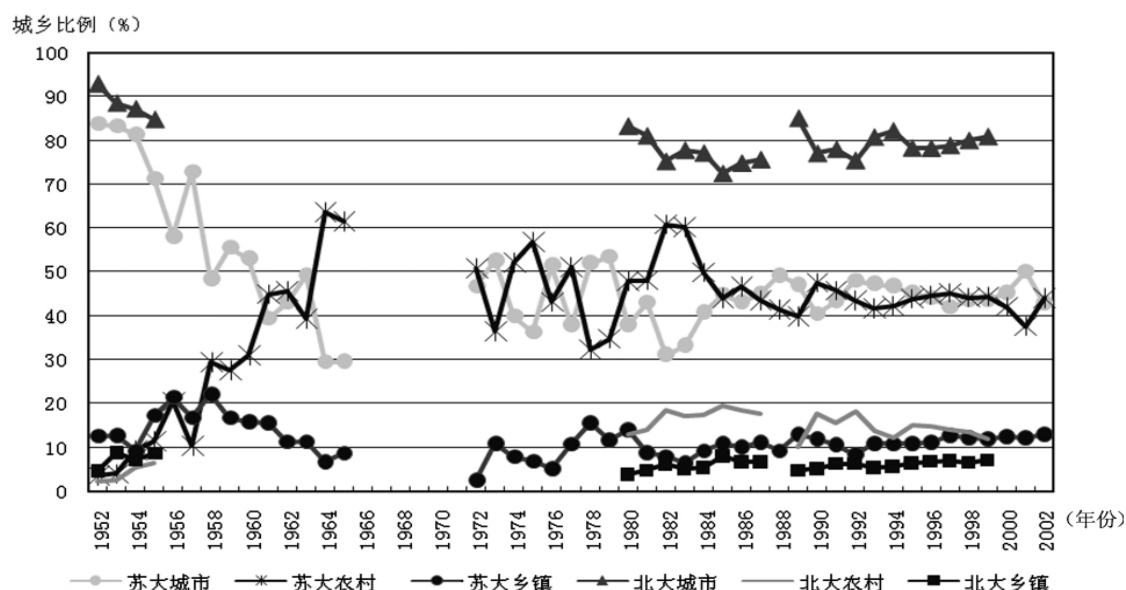


图 1: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每年新生的城乡分布(1952-2002)

苏大农村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北大，增长的速度也快得多。1952-1955 年间，苏大农村地址的学生比例从 3.6%增长到 11.4%，到 1965 年，经过 10 来年的增加，农村学生的比例突破 60%。“文革”中，农村和城市学生比例出现震荡和调整，农村生比例有所下降。恢复高考之初，城市学生的优势得到体现，比例超过一半，农村生则下降到 30%左右。但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很短。1980 年开始，农村学生比例又迅速增加。1984 年后的 20 多年中，农村生比例与城市生基本持平，稳定保持在 40%多的水平，没有出现太大波动。最近 30 年以来，苏州大学的乡镇学生比例也基本稳定在 10%左右，如果将其与农村学生比例相加，最近 30 年苏州大学城市以外的学生比例一直高于城市学生。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江苏的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响了两校学生的城乡分布。如 1990 年，北大农村生比例是 17.7%，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为 73.77%；1999 年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下降到 63.91%，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为 12%。不考虑人口分布的变化，北大农村生比例下降了 5.7%，而考虑人口分布变化后，农村生比例下降的幅度只在 3.3%左右。1990 年苏大的江苏农村生比例为 47.54%，江苏农村人口比例为 78.76%；2000 年苏大农村生比例是 42.09%，江苏农村人口却下降到 58.51%。农村生的人口比重实际提升了约 6.8%。

两校学生家庭地址的历史分析表明，1949 年以来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城乡来源具有多样性特点，两校农村学生保持着一定比例。北大在 1980-1999 年间，至少保持在 10%以上；苏大基本保持在 40%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在 1990 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城乡生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 21 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二)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对父母职业的分析

这里将探讨父母职业对子女精英教育获得的影响。按照《国家职业大典》分类标准，将两校 15 万多学籍卡中记录的家长职业整理归类为八大种类:(1)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 商业服务业人员；(5)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7)军人；(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两校学籍卡设计的差异，苏大学生一般只填写一个家长职业，且基本是父亲职业。北大学生要填写父母双方的职业，因此，本文表格中有关北大学生父母职业的数字是基于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从事某职业的数量。

统计发现，从1952年到1999年，26.2%的北大学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干部，37.46%的学生有家长是专业技术人员，19.97%的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有家长是工人，也有6.38%的学生有家长是办事人员，4.80%的有家长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在苏大，1952-2002年间，26.43%的学生家长是干部，16.77%的家长是专业技术人员，合计43.2%。5.06%的学生家长是办事人员，3.90%的学生家长是商业服务业人员，25.37%的家长是农民，16.77%的家长是工人。工农合计42.14%。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最大的差别在于专业技术人员比例(26.2%比16.77%)和农民比例(15.01%比25.37%)。下面将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每年的变迁情况制成曲线图(图2、图3)，并对主要职业变动情况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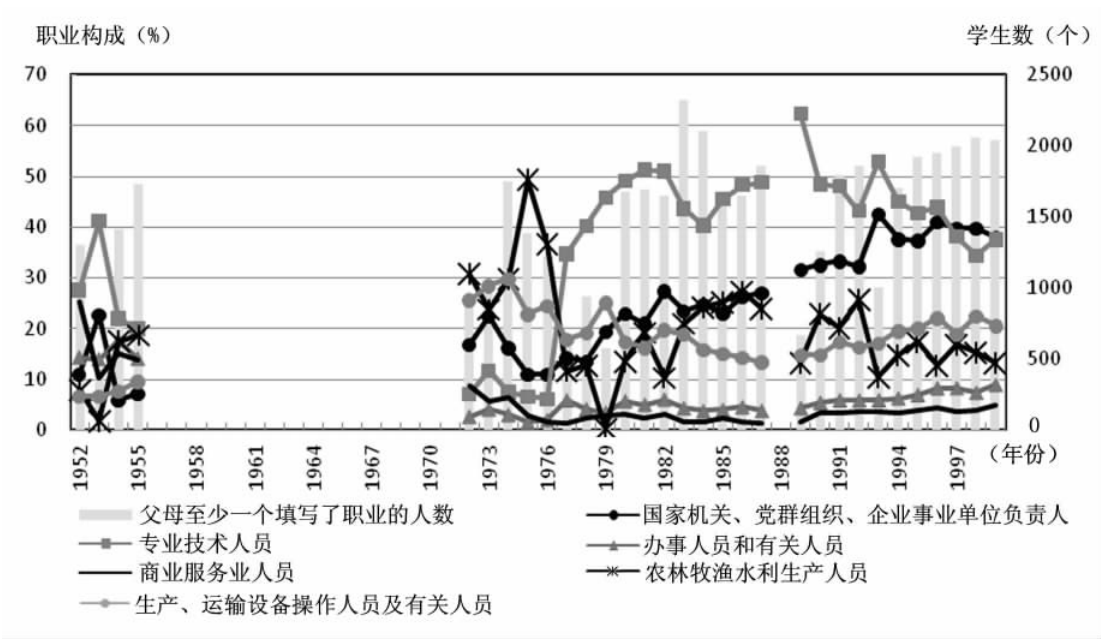


图2: 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分布(1952-1999)

说明: 大多数年份北大学生父母职业可识别的比率在70%-80%之间，但1976-1979年间偏低，分别为44%、48%、25%和25%，这也可能是1979年农民职业为零的主要原因。偏低的原因可能是恢复高考初期学生的年纪普遍较大，很多人已经结婚成家，学籍卡亲属栏中只填写了妻子（或丈夫）而不是父母信息。

第一，1949年后农民子女数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苏大的数据表明，这种增长一直持续，高潮出现在“文革”前而非“文革”时代。北大1952年时

农民子女的比例已经达到 8%, 1954 年迅速提升到 17%。苏大农民子女增长更明显。1952 年农民子女比例已接近 17%, 1955 年增长到 28%。北大档案馆 1956-1966 年学籍卡缺失, 无法得知该时段情况。苏大的情况表明直到 1966 年大学停止招生前, 农民子女的比例都在快速持续上升。到 1964 年几乎接近 60% 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 比例非常高。农民子女明显减少, 并非是恢复高考后而是“文革”时期的现象。1972 年, 北大农民子女的比例高达 30% 以上, 1973 年下滑到 20% 以上。苏大情况也类似, 农民比例从高达近 60%, 很快降低到 20% 左右。邓贤认为“文革时期 70% 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有政治背景。周雪光的研究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这表明取消较为客观的考试, 推行推荐制并不利于工农等群体, 即便是在极端“革命”的社会环境下也行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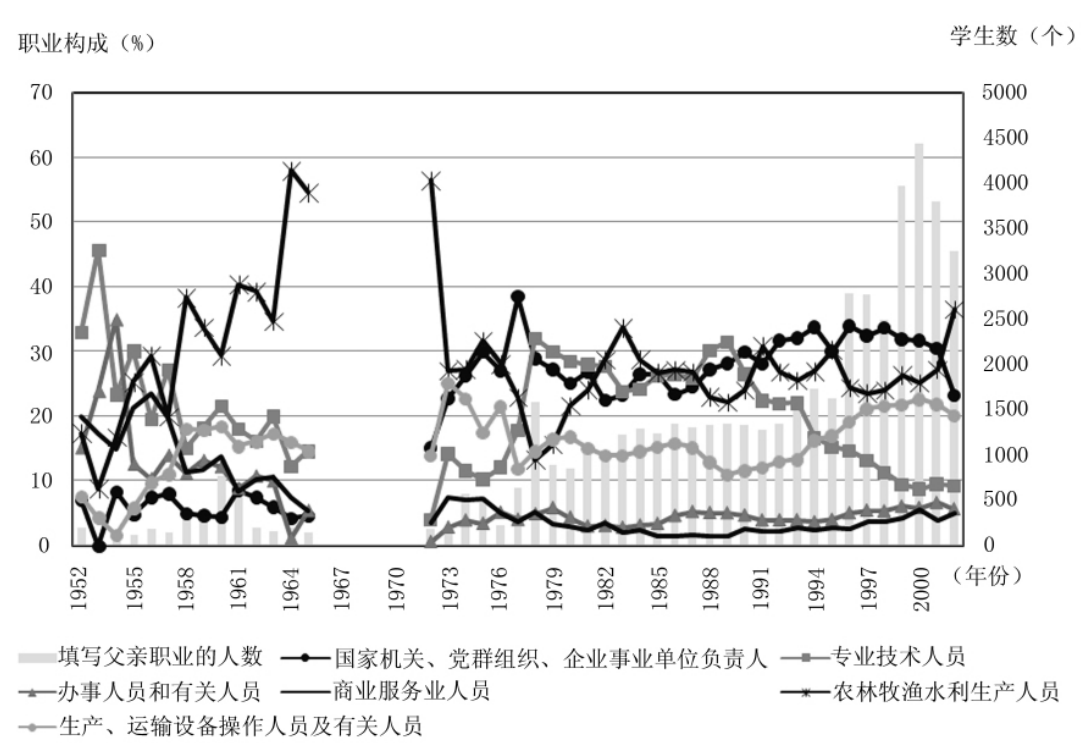


图 3: 苏州大学学生父亲职业分布 (1952-2002)

苏大数据还表明 (见图 4)，在农民子女内部，贫下中农子女比例不断上升，富农地主子女逐步从农民子女中的主体地位转变为边缘。1956 年以前，富农地主子女占农民子女群体的一半以上。1957 年到 1958 年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富农地主子女比例迅速下降，“瞬间”跌到 10% 以内。贫下中农子女数猛烈增长 (1956 年 46 人，1957 年 22 人，1958 年 242 人)，比例超过一半。“文革”时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富农地主子女基本退出精英大学领域，中上中农子女的比例

也持续下降，只有贫下中农子女“一骑绝尘”，几乎成为农民群体的垄断者。

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的比例有了新变化，北大的比例有所下降，苏大则比较稳定。高考刚恢复时，农民子女的比例一度跌到谷底，如苏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78年降到13%，是1949年后的最低点，此后有所回升。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19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19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相比之下，苏大农民子女的比例要高很多并且较为稳定，一直维持在25%左右，199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略微上升趋势。1982年以来，父辈职业中，“农民”在苏大更是仅次于“干部”的第二高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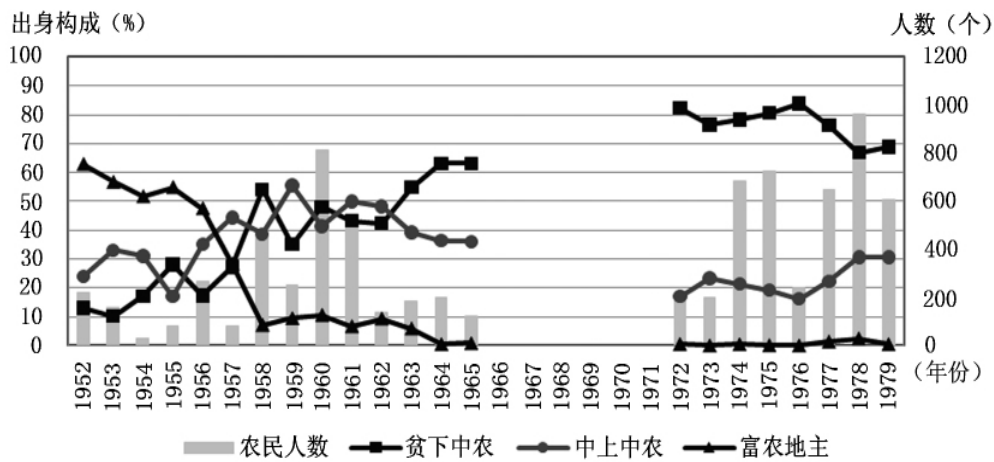


图 4：苏州大学农民学生家庭出身情况(1952-1978)

说明:有极少数学生的家庭出身填写为农民，无法区分者没有纳入此图。我们将雇农、贫农、下中农等归为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归为中上中农；富农、地主、富裕中农（根据1950年政务院农村阶级划分决定，富裕中农也具有剥削性质）等归为富农地主。

第二，工人子女比例在两校都呈持续增长趋势。1949年后受惠于向工农倾斜的大学招生政策以及基础教育的推广，两校的工人子弟比例都在不断上升，1950年代中期，比例均达10%。此后，苏大比例继续增长，1958年达到约20%。在“文革”和高考恢复后，两校工人子女比例在经历两次波峰的同时，1989年后都持续增长，并都成为位居第三位的父辈职业。虽然两校多年来学生父辈为工人的在比例上有一些差别，但在变动趋势上比较一致，全国和江苏地方精英大学工人子弟变动的因素应该一样。这可能是因为1949年后，城市及其居民基本都归国家体制管理，存在多方面的类似，不同地区城市间的差距小于农村。

工人子女增加的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文革”时期和20世纪末本世纪初。

“文革”时期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工人子女自然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两所大学的工人子女比例几乎都在 1973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其中北大一度接近 30%。此后工人子女比例有所收缩。高考恢复后，与农民子女情况类似，工人子女比例出现较大下降。甚至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的工人子女比例处于下降中。苏大工人子女比例尽管有过短时间的增长，但基本也在下滑。直到 1989 年以后，工人子女的比例才再次持续上升。到 20 世纪末，北大和苏大的工人子女比例都已超过 20%。这种现象应该与 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 1/3 左右，到 1990 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农民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子女比例的上升，部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变了职业，成为工人农民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下降，而工人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上升。工人子女比例的增加说明了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到 21 世纪初，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实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的“开门”。

第三，有关干部身份。近 50 年来干部的定义和性质一直在变化，干部自身教育水平也在提高。图 2 和图 3 表明，两所大学干部子女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从开始差不多最低发展到近期的最高。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 1952 年的 11% 上升到 1973 年的 22%。1974 年到 1976 年间，干部比例下跌至 10%。此后干部子女比例持续上升，从 1980 年代的 20% 以上，到 1990 年代初期的 30% 以上，到 1997 年更是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达 39.76%，成为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苏大干部子女比例在“文革”前基本在 8% 以下，1972 年后一下蹿升到 20% 以上。恢复高考后，干部子女比例从 1980 年代 20% 以上达到 90 年代 30% 以上，干部成为苏大学生来源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子女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对苏大学生父亲的干部职业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而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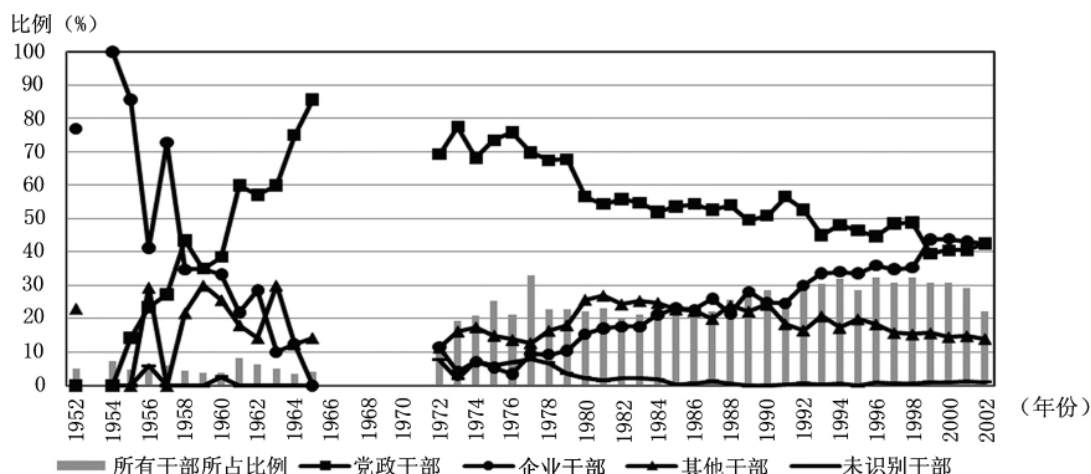


图 5：苏州大学学生干部家庭分布情况 (1952-2002)

需要指出，企业干部、经理人员的子女与党政干部的子女所占比例的变化状况有所不同。图 5 是根据苏大学籍卡中父亲职业及工作信息制作的历年苏大干部家长类别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干部比例迅速下降，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比例则在不断上升。党政干部比例在“大跃进”时期而不是“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却持续增长，到 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这一方面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很多政府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下海或转到企业任职，增加了企业干部的比例。传统意义上的“官”(包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众多乡镇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使得各种企业干部增加迅猛。因此，干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第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一直较高。1952-1955 年间，专业技术人员是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是干部子女的 2-3 倍。但在 1972-1976 年工农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曾低至 6%。高考恢复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迅速蹿升到 35%。此后不断提升，1980 年代基本在 50%左右，1989 年达到了创纪录的 62%。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又开始出现下滑趋势，1997-1999 年三年均低于 40%，稍稍低于干部子女比例。苏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在 50 年代也是最高的。1972-1976 年工农兵学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有所下降。1978 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从 1977 年的 18%蹿升到 32%。此后则基本保持在 25%-30%之间。但

从 1990 年代开始,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开始下滑,1998 年以后甚至低至 10% 以下。

1990 年代以来,两校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都出现了连续下降趋势。在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已经低于干部,在苏大,其比例不仅低于干部子女,甚至在 20 世纪末低于农民和工人子女比例。这与通常所认为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子女有更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更适应考试制度,具备取得好成绩的能力的情况较为矛盾。对此,尽管尚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但至少应该和以下几个原因有关:一是由于社会的发展,1990 年代以来,大量中年专业技术人员都具有一定职务。如各级学校校长、研究单位大小领导等。在我们的分类中,这些人基本都被归入干部类型,从而降低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北大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子女比例排位的交换,可能就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二是 1990 年代初经商热席卷全国,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纷纷“下海”,改变了身份。这种情况在全国包括江苏都较多。三是 90 年代以来四五十岁左右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对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影响有限。最后,也可能与 1990 年代以来私人出国留学热有关。基于视野和知识背景的关系,可能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职业群体有更强的意愿和能力促成子女留学海外而不参加高考。这也会导致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的下降。

第五,商业服务业人员。他们在全国职业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但在 1952 年,其子女在北大和苏大占 20%-25%的比例。这个时期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基本都是各类商业资本家或大小业主,是具有相当物质条件的人群。此后,由于各类政治运动的展开,商业资本家几乎消失,商业服务业人员主体基本是各类营业服务人员,他们拥有的教育文化资源水平降低了很多,其子女所占比例逐年下降。

总体上,50 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也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工人子女的比例在 1990 年代还上升了。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工人。因此,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女。也因此,农民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持续增长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达。学生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北大自 1981 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30%-40%。苏大自 1981 年以来只有 3 年是低于 39%的;1994 年以后则超过 45%;1999 年以后更是接近 50%;2002 年甚至达到

56%。因此，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苏大则已成为多数群体。

可以借助职业辈出率进一步考察两校学生家长职业的变化情况。这一指标能更为精确地反映各职业群体在精英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变化。表 1 给出了 1985 年以来两所大学学生家长职业辈出率的变化。

表 1：学生家长职业构成与职业人口分布比较(1985-2002)

北京大学						
职业类型	全国各职业人口比例 (%)		学生比例 (%)		辈出率	
	1990	2000	1985—1994	1995—1999	1985—1994	1995—1999
干部	1.8	1.7	31.26	39.17	17.37	23.04
专业技术人员	5.3	5.7	47.93	39.23	9.04	6.88
商业服务业人员	5.4	9.2	2.81	4.25	0.52	0.46
农民	70.6	64.3	21.40	15.02	0.30	0.23
工人	15.2	15.9	15.85	20.77	1.04	1.31
工农群体	85.8	80.2	37.25	35.79	0.43	0.45
苏州大学						
职业类型	江苏各职业人口比例 (%)		学生比例 (%)		辈出率	
	1990	2000	1985—1994	1995—1999	1985—1994	1995—1999
干部	2.8	2.6	27.34	29.26	9.76	11.25
专业技术人员	5.3	5.8	23.50	9.22	4.43	1.59
商业服务业人员	6.6	11	1.94	4.44	0.29	0.40
农民	58.2	52.3	24.67	26.82	0.42	0.51
工人	25.6	25.3	13.03	20.99	0.51	0.83
工农群体	83.8	77.6	37.7	47.81	0.45	0.62

注：1. 其中干部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农民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工人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 北大学生父母属于不同职业时会被计算两次，故比例之和可能超过 100%。苏大的数据仅根据父亲职业进行分类计算，若父亲有一个以上职业，则根据学籍卡中所填第一个职业计算。3 工农群体是指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之和。

干部子女在这两所精英大学的辈出率远高于其他职业子女。在 1995-1999 年间，干部子女在北大的辈出率为 23.04，即是本职业总人口比例的约 23 倍。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辈出率在北大和苏大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大从 9.04 降到 6.88；苏大从 4.43 降到 1.59。相比之下，两所大学中农民子女的比例远低于农民职业人口在全国或江苏人口中的比例。两个时期相比，北大农民子女的辈出率有所下降，苏大则有所上升；北大工人子女的比重迅速增长，突破 20%，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从 1.04 增加到 1.31，苏大的工人子女的辈出率也有所上升。

由于工人子女辈出率的提升，北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略有增长，苏大工农总体的辈出率则有较明显增长。

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因素。近 50 年，社会学界都承认并强调父母职业对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有决定性影响。科尔曼 1966 年通过对美国学校的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中国学者的研究则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这一现象，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模式。

北大和苏大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根据两校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虽然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总数占学生全体的多数或接近多数，但并没有像国外大学那样占绝大多数。北大工人与农民子女的总比例达到学生总数的 30% 以上，苏大工人与农民子女比例在 40% 左右。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对来源中学的分析

截至 2002 年，有 7000 多所中学给苏州大学提供过学生。给北京大学提供过学生的中学，截至 1999 年有 6000 多所。但为两校输送过学生的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学中只占很小比重。同时，少数中学为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 50 多年来只提供过 1 个学生的学校占据了绝大多数。来源中学的集中程度非常高，这是两所高校的共同特点。

表 2 给出了两校的来源中学及其输送学生比例的情况。北大的数据显示，1949 年以来 7.39% 的北大本科生来自前 5 所中学，这 5 所中学只占有向北大输送过学生学校的 0.08%。占来源中学前 3.08% 的中学（计 200 所）输送了 41.1% 的北大学生。前 5% 的中学输送了 50% 的北大学生，前 20% 的中学输送了接近 80% 的北大学生。在全部约 6500 所来源中学中，各中学向北大输送学生的能力和数量存在很大差异。苏大的情形类似。

表 2：北大与苏大来源中学数目及其输送学生比例(1952-2002)

来源中学数 (按输送学生数排列)	北京大学		苏州大学	
	占来源中学 比例 (%)	输送学生 比例 (%)	占来源中学 比例 (%)	输送学生 比例 (%)
前 5 所	0.08	7.39	0.07	6.88
前 10 所	0.15	10.71	0.14	10.31
前 20 所	0.31	15.07	0.28	15.84
前 50 所	0.77	22.44	0.69	28.41
前 100 所	1.54	30.75	1.38	42.14
前 200 所	3.08	41.11	2.76	56.84
前 500 所	7.71	57.82	6.91	72.17
前 1000 所	15.42	72.13	13.82	80.83
前 2000 所	30.85	85.46	27.64	88.59
前 3000 所	46.27	91.51	41.46	92.78
总计 (北大 6484 所, 苏大 7236 所)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1. 考虑到“文革”时期学生由单位推荐入学,表中排除了“文革”时期数据。2. 输送学生比例的分母是所有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人数,不包括辨别不出来源中学或没有填写来源中学的学生。除去“文革”时期,北大全部学生数为 55415 名,其中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为 46887 名;苏大全部学生数为 77542 名,其中填写了来源中学的学生为 73845 人。

考虑到这些中学在全国数量众多的中学中只占到很小的比重,精英大学来源中学的集中特征就愈发明显。图 6 是北大分年的来源中学数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比例。1950 年代前半期,全国整体教育状况有待发展,普通中学数量不多,北大每年 400-500 所的来源中学数量,能够占到全国普通中学总数的 1/3 到 1/2。在经历了高考恢复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来来源中学数量基本保持在 1000 所左右,但是,这一数字却只占到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数量的不及 8%。即恢复高考之后,每年只有占全国比重很少的中学有机会和能力为北大提供生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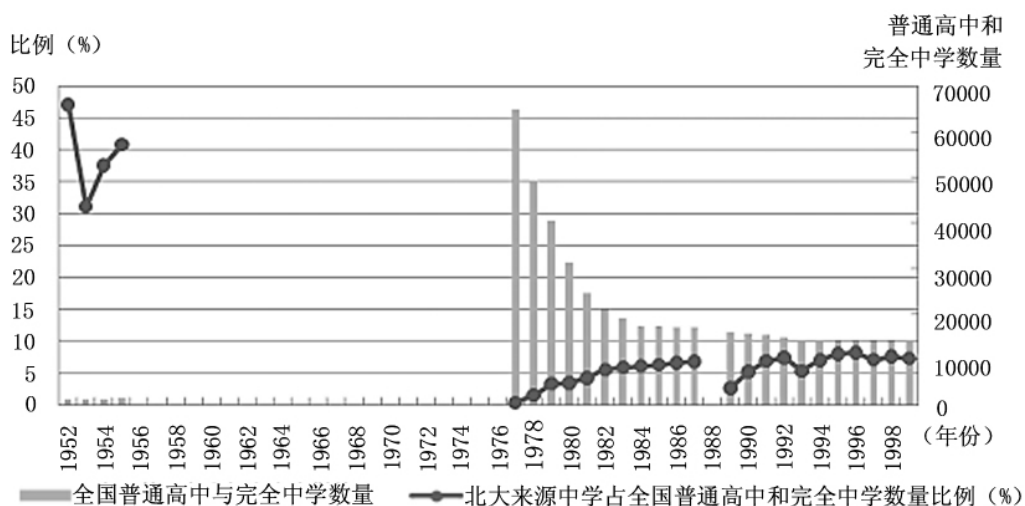


图 6：北京大学来源中学占全国普通高中和完全中学数量的比例(1952-1999)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向两校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重点中学。教育部 1981 年底统计，全国共有重点中学 4016 所(占全部中学的 3.8%)，其中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 696 所。统计结果显示，除去“文革”时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北大学生中有 54%来自首批办好的 696 所重点中学。根据数据可以推测，来自 4016 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以及来自各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重点中学的学生，可以占全部北大本科学子(除去“文革”时期)的 90%以上。江苏 1981 年确定了 95 所省重点中学，其中 26 所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1990 年代，省重点中学数量开始增加，2002 年最后一次评选后达到 249 所。苏大学生中有 14%来自教育部确定的首批办好的 26 所重点中学，近 30%来自教育部 1981 年确定的 95 所省重点中学，近 50%的学生来自 2002 年江苏省评定的 249 所省重点中学。如果再考虑各市县重点中学，苏大学生的重点中学比例很可能在 70%左右。重点中学无疑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主要生源输送基地。

偶尔提供学生的中学基本都是普通中学，其地理分布非常集中。北大生源校中普通中学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大则主要集中在苏州、无锡、常州以及南通等部分教育发达的区县。前者是因为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额比例很高;同时，北京的中学师资相对较好，普通中学也能培养出少数高考高分学生。后者则是因为苏州周边地区的中学教育在江苏是最发达的，不仅苏州、无锡等城市中学条件好，就连周边的江阴、常熟、海安的县镇中学也有较高的办学质量，能够培养出可以考入苏大的学生。

这表明，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一定要上

重点中学，才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北大数据显示，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

苏大数据显示，“县中”（县重点中学）是农村、小城镇学生进入大学的重要途径。为了保证优质中学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提高城市外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江苏全省每个县至少有一所中学进入1981年划定的95所省重点中学名单，这些中学即通常所谓的“县中”。这些县中提供给苏大的学生比例在各县全部中学中均排名第一，除一些教育比较发达、优势中学较多的县外，各县的一两所“县中”几乎提供了绝大部分学生。换句话说，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

总之，重点中学是进入精英大学的重要途径，保持和提高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即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

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与国外学校相比，中国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是突出的两个特点。许多中学，特别是县镇中学对学生实行住校制度。学生入校后，除了周末回家外，其余时间都在校内学习生活。学校内浓厚的学习气氛有效地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力而削弱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功的影响。例如江苏南通所辖六县一市的主要中学中80%的学生是农家子女，大多数寄宿在学校。他们进入精英大学的分数能力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强化训练是另一重要方法。江苏很多中学，特别是以南通各“县中”为代表的中学，为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学生早6时左右起床早读，上完一天8节课后，晚上6时至10时进行由老师“坐堂”的晚自修，每个月只放一天假。虽然这种教育方式可能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中国现行体制内，这种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精英大学中保持一定比例，更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学保持相当比例。

四、小结与讨论

借助两所精英高校学生学籍卡片的翔实材料，本文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

中国高等教育的这场无声革命，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声”社会政治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巩固了“有声”革命成果。无声革命虽然平缓，但力量强大，影响深远。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革命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中国精英教育领域内的这场重要转变，不仅相对于自身的传统是革命性的，而且与当下作为中国高教改革参照系的美国相比，也是成功的。二战以后，美国也曾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革命相比尚有差距。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受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0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政府多年来在基础教育普及和扩展方面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普及基础教育是提高工农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前提。其他影响因素在当下中国则有一定争

议，例如高考的作用。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益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至于在高校招生中照顾工农子弟的政策，在“文革”后已经不复存在，假如高考分数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在艺术、语言甚至阅历等方面增加其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另外就是重点中学作用。很多学者对重点中学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为重点中学对于工农子弟上大学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由于资料本身以及文章篇幅限制，暂时无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等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 2009 年《人民日报》发文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内农村学生大量减少，这一情况非常令人担心。如何保持过往无声革命的成果，是当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

无声革命并不能解决全部的公平问题，从两所大学的材料看，无论是地理分布还是父母职业抑或社会性别等，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有人认为北大这样的部属大学在实行省区配额时，存在过度的本地化倾向，导致了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如少数省只有万分之几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多数省只有 1‰ 的高中毕业生能考入北大，而北京却有 1% 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能考上北大。只有按省区人口数分配名额才能实现地区水平，但是，按人口招生也忽视了职业辈出率的差异。两所学校中农民的职业辈出率最低，即便在苏州大学，江苏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与江苏职业人口中农民的比例相比，也还有一定距离。只是简单提高这些省份的名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

我们认为，保持并进一步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看，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两所精英大学的材料表明，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

样性。现阶段，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认为，加强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自布劳和邓肯开创地位获得研究模型以来，学界就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产生了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本文作者梁晨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李中清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访问讲习教授；张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兰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阮丹青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康文林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善华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